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模式分析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起点

陈海燕¹ 陆明²

(1. 阜阳师范学院 安徽阜阳 236000; 2. 安徽大学 安徽合肥 230001)

摘要: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工业化的目标为起点。通过与上个世纪提出的“三农问题”、“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对比,我们现在再次提出“三农问题”、“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有了更多的要求和新的内涵,其提出的背景、出发点、追求的目标各不相同,现在进行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也遇到了城镇下岗职工的挑战、“技术排挤工人”等新问题。通过中外劳动力流动模式的比较、分析,作者提出了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上、制度上、措施上的新建议。如,现阶段不仅不能以缩小或消灭城乡差别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之一,而且还应当继续适当扩大城乡差别;改革现有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实行一定规模的土地拍包,走家庭农场式道路等。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工业化;小康社会;模式;创新

中图分类号:F249.2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69(2004)01-0001-05

一、“老曲新唱”

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随着改革之初农业经济体制创新的刺激力所产生的边际效益逐步递减,农民收入、农业经济、农村经济增长缓慢,1985年——1989年农民的纯收入平均增长率只有1.2%;1989年——1994年农民的纯收入平均增长率只有3%,不足同期城镇居民纯收入增长率的一半,其中,1989年——1991年农民的纯收入平均增长率只有0.7%,1989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农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别由1984年的1:1.71上升到1994年的1:2.61,此时,美国经济学家布朗甚至迫不及待的喊出“谁来养活中国人”。农村问题成为经济界和我国政府的关注焦点,“三农问题”频繁出现于政府文件和报刊杂志。其中谈论最多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增加农民收入。而提出的对策主要集中在:发展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引导农民有序进城务工,提高粮价,加大对农业的投入,走高农业的道路。

如今,在我们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迈向小康社会,实现工业化之时,“三农问题”又一次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话题。从党的十六大中的“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到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中的“三农问题”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同样,本次“三农问题”的中心依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增加农民收

入。

虽然这两次掀起的“三农问题”热潮从文字上看都是一样的,核心问题也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增加农民收入”。然而,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所谈的“三农问题”,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与十年前有着明显的时代区别。

第一次提出“三农问题”的背景是大部分农民刚刚实现温饱,我国的产业经济结构明显失调,第一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仍占据着大半个江山,国民经济、城镇居民的收入和粮食产量都在高速增长的同时,而农民的收入却增长缓慢。“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出发点在于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问题,提高农民收入,刺激农村经济结构和我国产业结构的协调,是“离土又回乡”或“离土不离乡”式的转移,农民进城的目的旨在“以农养口,以城挣钱”。

现在提出“三农问题”的背景是我国人民的生活在总体上已经实现了小康,我国的产业经济结构得到了明显改善,2001年我国的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为15.2%:45.1%:33.6%(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钱纳对世界上较发达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较发达国家中的一、二、三产业的生产结构一般为12.7%:37.8%:49.5%,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中第一产业基本适应,第二产业过高,而第三产业则过低);同时,农村居民家庭

收稿日期:2004-01-15

作者简介:陈海燕(1966—),女,硕士,阜阳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皖北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陆明,女,安徽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

人均纯收入也由1993年的人均921.6元增加到2001年的2336.4元,2001年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达到了5%,2002年上半年达到了5.9%。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工业化。而工业化的三个重要指标就是一、二、三产业的生产结构比例、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和城市化水平。

上文已述,我国目前一、二、三产业的生产结构比例达到了15.2%:45.1%:33.6%,但我们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却是50%:22.3%:27.7%,较发达国家中的一、二、三产业的就业比例一般为15.9%:36.8%:47.3%。这一方面说明50%的农业劳动力只能分享15%的产值,农民的收入难以提高;另一方面,我们要基本实现工业化达到较发达国家的水平,在今后的20年内至少要有34.1%的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总数约2.5亿,相当于整个美国的人口,是日本人口的两倍。

2001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的比重)为37.7%。钱纳等经济学家测算,基本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60.1%到65.8%之间。因此,一般认为,基本工业化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在60%以上。照此计算,到2020年我国则至少要转移农业人口约3亿,相当于整个俄罗斯人口的两倍。

也就是说,我们这次“三农问题”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直接出发点在于实现农民的“龙门”一跳,增加农民收入,刺激整个产业中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的协调,是“既离土又离乡”的转移,追求的是“离土致富,进城安家”。

如果说第一次的“三农问题”在于农民的脱贫,是现实的需要,那么,我们这次的“三农问题”在于农民的致富,是现实的需要,更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如果说第一次的“三农问题”在于农民的成家,那么,我们这次的“三农问题”在于农民的立业;如果说第一次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在于农民成为城镇中的农民工,名工实农,那么,我们这次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在于农民脱胎换骨,成为城镇的主人;如果说第一次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在于农民成为短期的打工者,那么,我们这次的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在于农民的长期充分就业。我们原来追求的是“总体上的小康水平”,而现在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由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在目前就是“农民就业”问题。我们只有认识到“三农问题”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时代要求,才能在原有对策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采取更加有效的新措施,

更好地解决问题。否则,总是揣着“乡镇企业”、“三高农业”、“外出务工”这些“旧船票”,老调重弹,仅仅重复过去的方法、对策,搞“二重唱”,只会事倍功半,也不知何时才能登上农村经济的“快船”。

二、历史使命与现实压力

(一) 历史使命

到2020年我们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实现基本工业化,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未来发展来看,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繁重、最艰巨的任务在农村;我们说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差距也主要在农村;目前尚未达到小康或者刚刚进入小康、收入还不稳定的人口也主要在农村。”这一历史使命迫使我们不得不重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农民收入问题。

同时,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的现象在上世纪末又一次重演,1997年—2000年农民的纯收入增幅连续四年下滑,分别比上年减少4.4、0.3、0.5、和1.7个百分点,增长率由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2.1%,真可谓:旧“情”未了,又添新“愁”。

62.3%的农村人口、50%的第一产业就业比例和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的反复,不能不说是我们实现工业化的三个拦路虎。

(二) 现实压力

劳动力是一个活的生产要素,其能力的发挥要依赖于其它要素的投入,比如:资金、土地等。而对于农村来说,资金缺乏,耕地资源减少,并且农民的技能水平低,只能从事简单的劳动。使得农民都集中在土地“岗位”上,可我国农村劳均耕地不足0.2公顷,但按现有的农民生产能力看,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以耕种0.7公顷的土地,甚至更多,农民就业严重不足,据统计,农村现有剩余劳动力高达2亿人,造成农村劳动力的低效利用,即使这部分人离开土地也不会使农业的减产,即其边际生产率是零。

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主要是看农业中土地、资金、劳力各资源的利用程度。这种关系可以用函数来表示:

$$E_a = T \cdot C \cdot f(H + M + S)$$

其中, E_a 表示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T 表示科学技术促进系数;

C 表示环境限制系数;

f 表示函数关系;

H 表示农业中劳动力资源的利用程度;

M表示农业资金的利用程度;

S表示农业中土地的利用程度。

我国的农业基础薄弱,投入少,资金缺乏,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对已有的资金和现有土地的利用水平,已经难以再有大幅度的提高,对Ka影响最大的只有H因素。

而劳动力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虽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生产效率极低,边际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值,但其消费总不能停止。我国目前有农村剩余劳动力约2亿,按每人每天的总消费折合1公斤的粮食计算,每年就消费约912亿公斤的粮食,约占当前全年粮食总产量(5000亿公斤)的14.6%。这笔毫无补偿的巨额消费不能不说是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一个沉重负担。

并且,劳动力具有不可保存性,这一区别其它资源的特点,使得劳动力的使用如果不及时进行,就会“过期作废”,造成这一资源本身的巨大浪费。

面对历史的使命和现实的压力,我们必须要有针对性的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采取新思路、新举措,再谱“新曲”。

三、“新曲”面临新困难

1、党的十六大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鉴于此,我国目前由追求速度为主要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创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方式。这其中也当然应当包括农民就业,也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20世纪八十年代相比,现在农民就业的难度越来越大。主要因为,我国城镇中1998—2001年就积聚了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2550万人,很多原来农民工的就业门路被下岗职工的再就业所挤占。

2、现代工业的典型特征就是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信息化程度越来越高,“机器排挤工人”也必然同时出现,农民就业越来越难。同时,较低的文化素质,也使得农民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中难寻更多的用武之地,其就业范围仍然是传统的“三转一包”(围着锅台转——餐饮服务、家政服务;围着工地转——建设工地上的苦力、短工;围着垃圾转——城市环卫、捡垃圾;或者到小私营企业作坊中成为类似于过去的“包身工”)。

3、科技水平的日益提高也使得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单位投资所能吸纳的就业人员或可以提供的工作岗位(就业弹性)越来越小。1979年—2000年第一产业的平均就业弹性为0.06,第二产业

为0.34,第三产业为0.57。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个数字还将大大下降。这说明同样数量的投资已经很难为失业者创造出象原来一样多的就业岗位。

4、经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使得农村贫困人口由8000万减少到2001年底的2800万。然而,这剩下的2800万都是难啃的骨头,是难上加难(生活的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极差)的困难户,要使他们与其他人一起步入小康社会,其难度要远远超过“八七”攻坚。

5、随着下岗职工的的积聚,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负担日益沉重,城镇居民所享有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优惠政策难以惠及城镇中的农民工,使得这些农民工沦为城镇中的“二等”公民,在他们心中,城镇只是他们的临时的落脚点,而不能是安家之地。

四、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

农村人口为了就业向城镇和第二、三产业转移是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化的必然过程,也是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不能避免的过程。不少的经济学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动力和过程作了总结,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模式。最著名的有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式和托罗达模式。

(一)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式

这个模式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后经费景汉、拉尼斯补充修正而成。这个模式强调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而出现剩余产品,使得农村劳动者流向城市。这个流动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工业迅速发展所出现的就业机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拉力”,另一个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使得农业劳动者“过剩”而产生的一种“推力”。我们把这种模式称为“积极模式”。可以用函数来表示:

$$M_t = f(R_i + R_a)$$

其中, M_t 表示流向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f 表示函数关系;

R_i 表示工业发展所提供的就业机会;

R_a 表示农产品生产率的提高水平。

但这种模式和我国的国情相比有其不足之处:

(1)我国目前工业发展的速度虽然很快,但不能给农村剩余劳动力带来充分的就业岗位。而且,在我国城镇本身就存在着大量失业劳动力。可以说我国人口流动的决定因素在于劳动力过度“膨胀”的自身弥散作用。

(2)从我国目前状况来看,农产品生产率的提高仅对农户本身的需求出现了剩余,而对整个国民经

济发展的状况,尤其在产品质量的要求上和产品结构上来看仍然不足。这种农户(农民个体)的剩余也确实给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带来“推力”,但这种“剩余产品”的推力和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式中“剩余产品”(农业整体)的推力有着质的区别。

(二)托罗达模式

另一位经济学家托罗达提出了另一种流动模型。他认为,即使城市已经存在着大量失业人口,但只要城市就业的预期收入高于农村时,农村人口也会向城市流动。而且他强调决定人口流动的不是当时的城乡收入差别,而是城乡收入的预期差异和城市就业机会可能性的大小。比如,一个农民的年收入为1000元,城市收入为3000元,如果预计在城市就业的可能性为20%,则一年预期的工资收入为600元,而不是3000元,这样他就不会到城市找工作。如果城市的就业机会为40%,则预期年工资收入为1200元,多于1000元,他就可能会流入城市就业。这个模式我们称为“期望模型”,可以用下述函数关系式来表示:

$$M_t = f(PW_i - W_a)$$

其中, M_t 表示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f 表示函数关系;

P 为城市就业概率;

W_i 为城市年工资收入;

W_a 表示农业年收入。

这个模型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也有差异。我国很多农民是盲目地流入城市,其直接目的往往是 W_i , 而不是追求 $PW_i - W_a$ 。

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式和托罗达模式给我们的启示:一方面我们要引导资金投向就业弹性系数大的行业或部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要建立国家粮食安全保障系统,为农民提供最低粮食供给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确保农民流动无后顾之忧。

(三)我国现阶段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模式和动因

1. 中国农民目前生活的一般状况与人口流动

对于我国农民来说,大部分已超过温饱,达到或接近小康,小部分仍在贫困线上下,中间状态的少,而这两种生活水平的人都易产生劳动力的流动。对于小康型的农民来说,其家中的口粮有了富余,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已为零甚至负值,他向外流动后,无后顾之忧。这种人极易带着对城市生活的向往而进城寻求“发展之路”,在这些人流动

之前,很少考虑 PW_i , 因其机会成本为零,他仅仅追求的是 W_i 。我们把这部分人流动的动力称为“积极动力”;而对于贫困线左右的农民来说,在农村辛苦劳作一年,也仅能糊口。“穷则思变”,在城市生活的感召下,以及农民沉重负担的推动下,这一部分人甚至举家迁往城市,寻求“淘金之路”,他们的流动动力是“贫穷”,对于他们来说有最保险的两种“就业手段”:乞讨和捡垃圾。我们把这部分人流动的动力称为“灰色动力”。在这种动力下,民工所追求的也是 W_i , 而非 PW_i 。

2. 收入差别与人口流动

我国的城乡收入差别、地区收入差别依然存在,而且日益加剧,1978年城乡收入差别为1:2.37,1984年下降到1:1.71,1992年为1:2.33,1993、1994年分别为1:2.58、1:2.61,而2000年、2001年已经达到了1:2.79、1:2.90,创最高水平。从地区差别来看,1983年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收入比为144:126:100,1994年为189:127:100,2001年为262:129:100,东部和中西部的收入差距明显拉大,从典型农户人均纯收入来看,20世纪八十年代,广东为495元,安徽为126元,四川为315元,贵州为288元,广东省与后三省的绝对平均差为171元,到了九十年代,广东为1675元,安徽为725元,四川为698元,贵州为580元,广东省与后三省的绝对平均差为913元,比八十年代提高了615元。正是在这种收入差别的吸引下,刺激和加快了农民向城市、向发达地区的转移就业。我们把这种收入差别的动力称为“刺激动力”。

通过上述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农民流动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积极动力”、“灰色动力”这两个内因,以及“刺激动力”这个外因,而三个方面都可归结为我国目前的农业比较利益极其低下;城市的工资收入及城市生活对农民产生的巨大引力。我们可以将我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模式用函数表示为:

$$M_t = f(W_p + W_i)$$

其中, M_t 表示流向城市的农民数量;

f 表示函数关系;

W_p 表示农业的比较利益差别水平;

W_i 表示城市工资收入。

这个模式给我们的启示:城乡收入差别越大,农民流动的动力越大。我们不当把城乡收入差别作为一种落后的象征,总是进行批评,或企图消灭,而应当在双方都增收的基础上适当扩大城乡收入差别,加大农民向城镇流动的推力,刺激更多的农民向城镇流动;另一方面,我们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不

断增加城镇的工资收入水平,加大农民向城镇流动的拉力。

五、唱新曲,走新路

唱新曲,走新路,并不是把“老调旧路”都忘掉,而是在原来的经验、良方的基础上“买新票,登快车”。

1、理论上我们要重新讨论城乡差别问题。消灭城乡差别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而非当前目标。从理论和实践来看,适当扩大这种差别,有利于农业人口向城镇流动。

2、扩大“剩余劳动力转移”这一说法的内涵,着眼于农民就业、农民转移、农户迁移。以剩余劳动力的流动带动农业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水平,把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作为农民就业工程、家庭迁移工程来抓,最终追求农民流而不动。

3、在制度上要推进家庭承包制的改革以及配套措施的改革。收回集体耕地,根据机械化水平,以2—3公顷(或成片耕地)为单元进行家庭拍包,让有能力的家庭生产者来办农场,走农场式的发展道路,促进农业生产的集约化、产业化,更有力地迫使没有承包地的家庭流入城镇。以新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和中央关于《农村承包地使用权流转的规定》为契机加大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力度,建立农村承包地的二级市场。

4、建立健全农民以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农村流动人口的应急保障体系,防止“SARS”类的问题重演(当前,在民工流出的省份,把阻止民工返乡作为防治“非典”的关键,严防死守,对民工

“围、追、堵、截”)。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有计划,有组织地疏导农民就业,建立农民就业和企业用工的强制管理制度,完善立法,加强民工权益的保障,加强农民就业的各项服务工作。

5、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一定要把技术密集型 and 劳动密集型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另外,还要改变投资过多关注虚拟经济,很少问津实体经济现状。

6、对于生存条件恶劣的特困村庄可以通过政府补贴给予强制迁移。据计算,一些条件恶劣的特困村庄的“三通”(通公路、通电、通广播电视)费用少则数十万,多则百万。不如将这些费用补贴给农户,强制其迁入城镇,一劳永逸。

7、充分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积极进行国际就业。资料表明,劳动力的成本若以日本为100,则美国为66,英国为32,韩国为24,泰国为6,中国为3.5,这说明我国劳动力在国际竞争中的实力是相当强的。

参考文献:

- [1]胡锦涛.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讯,2003.3.
- [2]陶文达.发展经济学[M].中国财政出版社,1992.
- [3]中国统计年鉴[M].1985年—2001年各卷.
- [4]刘振伟.关于促进农民增收的几个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02.10.
- [5]国务院体改办“就业与分配”课题组.促进就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N].中国改革报,2002.5.22.
- [6]林兆目.新型工业化道路标准[J].宏观经济研究,2002.12.

An Analysis on the Economic Mode of Rural Surplus Labor Transfer

CHEN Hai-yan¹ and LU Ming²

(1.Fuyang Normal College, Fuyang Anhui 236000; 2.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01)

Abstract:Based on the objective of building China into a relatively well-off and industrialized society, compared with the issue of farmer, rural area and agriculture, as well as the question of the transfer of surplus rural labor which were brought forth last century, we put forward these questions again, with a new denotation and requirements, also different background, starting point and objectives. The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has now encountered new problems such as urban laid-off workers and technological barrier. Through an analysis and comparison of China's and foreign countries' labor flow patterns,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some new suggestions as to the theory, system and measures of rural surplus labor transfer.

Key words:Surplus Labor;Industrialization;A Relatively Well-off Society;Pattern;Innovation

(责任编辑:吴建萍)